

選舉制度、候選人提名制度 和政治代表性關係的探討

一個分析架構的討論*

陳澤鑫**

收稿日期：2017年7月7日

接受日期：2018年2月4日

* DOI:10.6164/JNDS.201806_17(2).0002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研究方法與量化研究、形式理論、選舉與投票行為；E-mail: sehsin@mail.ntpu.edu.tw。

摘 要

本文的主要任務在於討論一個政治體系下，在總體層面運作中，透過選舉的政治甄補過程，政治體系的輸入（即民意）如何受到黨內政治裡的候選人提名制度的影響，更進一步透過選舉競爭的形塑，最後反映到政治體系的輸出（即政府政策）。因此，本文將依變項定義為政治代表性（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其運作化方式是選民偏好和政府政策契合度。我們並把選舉制度看成是影響代表性的獨立變項之一，並假設為直接效應的路徑。另一方面，選舉制度也會透過黨內提名制度對代表性發生作用，這是選舉制度透過黨內提名制度對代表性的間接效應。本文嘗試提出一個概念性分析架構來釐清這三個變項之間的效應大小的影響，以做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引導。

關鍵詞：政治代表性、選舉制度、黨內提名制度、因果模型

壹、引言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政治平等，係指在民主體制下，分配給每位公民可運用來影響公共政策的資源的平均性。而在代議制中，體現此一前提的是在政治體制下的所有具有公民權的成年人，皆能在自由公平的選舉中表達個人的偏好。而其中政黨扮演著匯集人民偏好，並互相競爭取得政權的角色 (Dahl, 1998, 2006)。儘管許多學者對於何種政黨競爭體系最能代表人民主權的討論仍有不同的見解，但是這些理論都強調了政黨制度是代議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黨有別於其他利益團體的功能，最主要在於凝聚人民的偏好來轉化成爲幾個比較少的政策選擇。¹

從實際民主的運作經驗來看，一個政治體制的政黨制度特徵，會與選舉制度交互作用，出現兩黨制結合單一選區制，或多黨制結合比例代表制，也區別了人民偏好如何被表達的不同民主模式，是西敏寺模型還是共識模型。這兩種模型的基本的差異在於代表人民偏好的政黨數目是兩個或多個，換言之，在選舉中可供公民挑選的抉擇數目的多寡不同 (Lijphart, 2012)。從制度面來看，造成此兩種模型的重大差異的因素是選舉制度的比例代表性。當選舉制度的比例代表性越高，則穩定地可代表人民偏好的政黨數目越多 (Cox, 1997 ; Lijphart, 1994, 2008 ; Rae, 1971)。更有甚者，若以選舉制度看成是轉換人民偏好的不同機制以及政府政策對人民偏好的反應程度，則多數決視角和比例性視角分別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民主過程，前者出現的是多數黨政府和提供選民清楚的投票抉擇，後者較能反應不同聲音，提供選民多

¹ 關於在民主理論下如何實現人民主權的不同政黨競爭體制的討論與比較，請參見 Katz (2006)。

樣的投票抉擇 (Powell, 2000)。因此，在連結公民的偏好和政策產出的過程中，政黨在不同的選舉制度的限制下，與在社會各種條件下，譬如種族、階級和宗教等的多樣分歧程度的環境背景之下，扮演了提供公民投票抉擇的選項，來匯聚民意轉換成爲席次。政黨在選舉之後進入國會殿堂且同時或獨立地進入行政部門，爾後在政府體制的制度框架中，政黨間進行協商制定政策對民意做出反應。

民主政治下的選舉制度，對於民意如何轉換到民意代表的過程，具有重大的影響力。這個過程可以分爲幾個步驟，首先是民意是否在選舉中表達（投票與否與投票給誰），接下來是選民可以投票的選擇有哪些，然後是選民決定投票，並將得票數轉換爲席次。以上是連接民意與政府政策過程的前半部，是關於民意代表的甄選過程。後半部則是政策制定過程，由已當選的民意代表協商討論政策的內容。在內閣制底下，由這些選出代表進行菁英協商與政府組閣的過程，經過政府的運作才會產生政策；若是在總統制下，是民選的總統與國會的制衡過程產生政府的政策。在前半部的民意代表產出的過程，我們可以分成三個元件和兩個面向來分析，第一個面向是微觀面向的個人投票行爲，是選舉制度的總體因素，如何影響選民投票與否和投票抉擇，² 這是第一元件；第二個面向是宏觀面向中的不同整體因素的相互作用，這是選舉制度如何影響政黨內（intraparty）的提名制度（candidate selection）與策略和政黨的競爭模式（interparty competition），這兩個分別是第二和第三元件。第三元件在本文稱爲選舉制度的直接效應

² 有關選舉制度的總體因素如何對個人的投票行爲造成作用，以下是一些例子。關於選舉制度如何影響個人投票意願的討論，請參考 Blais (2000) 和 Chen (2011)。Norris (2004) 比較理性抉擇的制度主義和文化的現代化理論途徑對個人投票的影響。Kedar (2009) 探討不同選舉制度下造成了選民的政策補償預期心理，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抉擇。關於系絡如何形塑公民的選舉抉擇可參考 Dalton and Anderson (2011)。

(direct effect)，Downs 的空間理論討論了選舉制度如何造成政黨競爭策略的議題立場選擇是趨中或分散 (Downs, 1957)。而前面討論的第二元件則是選舉制度的間接效應 (indirect effect)，是政黨競爭的先決條件的形成，政黨在納入選舉制度的條件的考量下，進入政黨競爭的前置作業，決定由何種類型的候選人來代表政黨出征。本文理論模型的範圍著重於宏觀面向中整體因素間的關係，而文章的目的在於嘗試提出一個釐清第二個元件和第三個元件如何對民意與政府政策之間的連結產生影響的因果關係模型。

前述因果模型的建立，對於民主憲政的制度設計中各種因素影響的考量，有一定的幫助。此因果模型著重於民意如何被轉換為代議士過程下，選舉制度的影響，與後面政府架構的制度設計對決策過程的影響，兩者同樣對於政策產出都有作用，不能分開視之，否則民主品質就無法確保。為何此因果關係重要呢？如果只考慮選舉制度，那麼我們無法區分選舉制度對政黨間和政黨內競爭的影響，這是所謂的總體效應 (total effect)，此模型的第一重點在釐清，選舉制度的效用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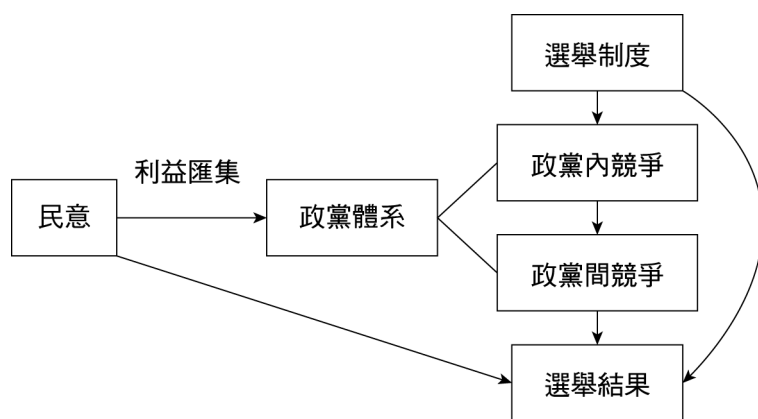


圖 1 選舉制度、黨內競爭和黨間競爭的因果模型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多少是透過政黨間的選舉競爭產生的，而又有多少透過政黨內的競爭產生的，此模型的第二重點區分選舉制度的效用又有多少是透過不同黨內提名制度在作用的，而只考慮總體效應並無法達成這兩個重點的要求。所以此因果模型有助於瞭解不同選舉制度和黨內提名制度組合對民選代表的甄選品質的作用。

由於不同選舉公式決定了選民的票數如何被轉換成國會席次 (Lijphart, 1994; Taagepera, 2007;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亦決定了民意代表如何被選出與政黨的輸贏。本文把這個現象稱為選舉制度的直接效應，原因是不同的選舉制度造成不同政治體系下政黨之間的競爭模式也不同。競爭模式的差異基本來自於為了勝選的考量，政黨在議題空間是否在政策立場上具有趨中性，並產生了不同的有效政黨數，這是政黨間的策略協調問題 (Amorim Neto and Cox, 1997; Cox, 1990, 1997)。從選舉制度研究的歷史發展來看，學者對選舉制度影響研究從早期關注程序代表性 (procedural representation)，即探討選舉公式的席次轉換的機械效果與比例代表性，緩慢地已經擴展到實質代表性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的研究 (Powell, 2004)，即政府的政策產出是否與民意契合。此乃因為政治代表性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起源於公民偏好的顯現，也是一個從整體的角度來評判政治平等是否實現的標準之一。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可偏離人民意志，否則人民可以在下次選舉時換黨執政 (Riker, 1982)。

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名單並非憑空出現，是經過黨內政治運作的篩選過程產生。而政黨的提名策略與不同選舉制度下贏得勝選息息相關，這是選舉制度的間接效應。政治甄補是政黨的重要功能之一，政黨的甄補廣義來說包括民選職位候選人的提名與恩庇侍從關係下可以任命的職位 (Norris, 2006)。本文探討的甄補範圍是有關前者的篩選過程與其制度為何，政黨重視何種政治菁英能被提名競選公職，不但是因為經由政黨背書的候選人，是成為民意代表的重要管道，更是因

為政黨提名人的組成也會影響政黨的形象。候選人提名制度在大部分國家都是黨內政治的產物，除了少數國家由法律來規定黨內初選外，³ 政黨可以決定候選人的提名辦法與過程，因此候選人的提名可視為黨內事務且其性質是不受國家法律的約束（Hazan and Rahat, 2006）。政黨的候選人提名過程可以說是政治體系的政治甄補的「關鍵階段」（a key stage）（Gallagher, 1988b: 2），而這個過程是政黨對於他們所處外在政治體系中的政治制度，如選舉制度做出的反應。因此在選舉中，選民可以投票給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之後當選的代表進入國會或政府之後如何代表民意，全都依賴黨內的提名過程，當然也對政治代表性的品質產生影響。政黨提名對代表性的影響力，可從這些被提名代表是否能夠表達，政黨支持者的意見和他們的政策立場，這兩個角度來評判，並忠實地在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中表達出來（Hazan and Rahat, 2010；Pitkin, 1967）。

本文的主要任務在於討論一個政治體系下，在總體層面運作中，透過選舉的政治甄補過程，政治體系的輸入（即民意），是如何受到黨內政治裡的候選人提名制度的影響，更進一步透過選舉競爭的形塑，最後被反映到政治體系的輸出（即政府政策）。如果我們從政策產出的時序倒敘來看，由於被政黨提名的候選人當選的機率通常來說比較高，哪些公民可以被政黨提名成為黨提名候選人，並在當選為民意代表進入政府之後做出政策決定就十分重要。因為從提名過程就決定了哪些利益被表達和誰可以參與，並關乎公民的偏好是如何被代表到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從民意匯集的角度來看，黨內政治的提名過程出線的是社會中透過政黨機制與民意選擇的集合，經過選舉過程中政黨間的競爭模式，此一民意選擇集合會再次被匯集成更小的一個民意選擇集合，也就是當選的民意代表。在這個過程中影響民意轉換的背景因

³ 如德國、芬蘭、挪威和美國。

素是選舉制度，首先因為選舉制度先於每次選舉而存在，所以就因果關係發生的先後順序來看，選舉制度是影響政黨競爭模式的原因；其次，因為不同選舉制度主要組成的兩大元素是選舉公式和選區規模 (D)，選舉公式意指選票如何被轉換成席次的計算方式，選區規模是每個選區的應選席次。在此兩大因素的影響下，即使採用不同的選舉公式，經過選舉的競爭過程後，每個選區有希望勝選的候選人人數會朝向 $D+1$ 來發展的趨勢。譬如若選區規模是 1，則有當選希望候選人在選前通常會限縮到二名，以此類推，選區規模若是 3，則支持度比較高的候選人數會接近四名 (Cox, 1997)，所以每個選區政黨的選票基礎或當選實力會影響政黨內的提名策略和政黨間的競爭模式。以另外一種方式來說，在不同選舉制度的選區規模來劃分選區的制約下，政黨在勝選的考量下，在一個選區中，內部必須先協調不同的利益和聲音，來推出適當額度的候選人來穩固黨內的支持者的聯盟；之後在競選過程中，各政黨所提名的各組到最少一個候選人相互競爭來爭取選民的支持，組成選民的勝選聯盟。

因此，本文將依變項定義為選民偏好和政府政策契合度，並視為衡量政治代表性的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 指標，並將選舉制度看成是直接影響代表性的獨立變項之一，這是直接效應的路徑。然而，選舉制度也會透過黨內提名制度影響代表性，其影響方式的路徑如下，選舉制度對黨內提名制度會產生影響，而黨內提名制度進一步對代表性產生影響，這是為選舉制度透過黨內提名制度對代表性的間接效應，黨內提名制度是中介變項 (mediator)。此一結構性關係在許多學者的因果關係模型都有詳細的討論 (Fox, 2008: 110-113; MacKinnon, 2008: 48-51; VanderWeele, 2015: 21-22)，這對釐清這三個變項之間的關聯性為何大有幫助。譬如有些學者研究選舉制度對代表性的效用模型，並未控制黨內提名制度的影響力，也就是並未區分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影響，而只估算總體效應。另外有些學者的研究間接效應的

一部分，如有些研究把黨內提名制度當成受到選舉制度影響的依變項，有些研究把黨內提名制度當成獨立變項來估算對代表性的影響。所以，在提出一個關於代表性、選舉制度和黨內提名制度的因果模型，研究者才能確認選舉制度對代表性的影響有多少是來自於黨內提名制度的中介效應（mediated effect），使我們更能夠評斷黨內提名制度在這一過程中的影響是大還是小。

貳、選民偏好和政策產出的連結

政府公共政策對選民偏好變化的回應程度（responsiveness）並非直達，第一是選民透過投票來表達他們的偏好為何，第二是選舉制度轉換票數決定民意代表，第三是在不同政府架構下如內閣制、總統制或半總統制下的政策制訂過程，最後是政府政策的執行與輸出。所以民意最後如何反映到政府政策的執行上，中間還需要經過選民的投票行為，與選出政策制定者的兩個階段，要使得第一個階段的選民偏好，能夠準確無誤地傳達到第四個階段，需要不同階段過程之間的連結，能夠把上一個階段的訊息，完整的表達到下個階段，否則公共政策就偏離了民意。從選民偏好到選民投票行為的連結機制是選擇的建構，即在選舉中提供給選民的投票抉擇集合，而影響這個集合內容的因素是政黨體制的穩定性和黨內提名制度。從選票到當選的席次的連結機制是制度性的利益匯集，其中主要的制度是選舉制度。從當選民意代表到公共政策的連結機制是政策制定過程，造成政策制定品質差異的因素是政府體制的不同（Powell, 2005）。而本文所關切的重要因素，即為第一和第二連結機制中，黨內提名制度和選舉制度對回應程度的影響。

一、選舉制度的影響力

選舉制度對於選民偏好與政府政策契合度的影響，主要根據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單一選區多數決制和比例代表制。Powell (2000) 證明經驗上採用單一選區多數決的國家，藉由製造出來的國會中的過半多數席次傾向於產生一黨政府。例如即使最大政黨得票率未超過 50%，亦會將多餘的席次獎勵給他；比例代表制則會產生和社會中存在分歧和種族成比例的立法機構席次。也就是說，前者是單一多數控制政府的概念，政府的責任歸屬和其擁護政策選擇清楚；後者是社會中公民的偏好能夠被忠實反映到立法過程中，這兩者代表的是十分不同的政策制定過程。

若將代表性定義為選民偏好與政府政策的一致性 (congruence)，並藉由比較選民在左右議題立場上的自我評量的分配與和專家觀察評量政黨在同一議題光譜上的位置，然後比較在選民偏好分布的中位數選民 (median voter) 位置和政府政策產出的距離。採用前者的原因是中位數選民的政策位置至少可以獲得社會中一半選民的支持 (Huber and Powell, 1994)。而後者政府政策產出的部份，內閣制下會受到單一政黨政府或聯合內閣政府型態的影響。在民主政治下的立法過程中，政策的通過是以多數決為基本精神，若是單一政黨政府，最後通過的政策是以該黨的議題立場為準；若是聯合內閣政府，則是以參與執政政黨間的議題立場妥協結果，作為最後政府通過的政策的位置。這兩者之間的距離越接近、距離越小，代表政府執行的政策越接近民意，一致性越高。

如果把選舉當成是傳達選民偏好分布的中位數選民的機制，進而主張中位數選民的偏好在授權理論 (mandate theory) 中極其重要，代表中位數選民的位置應該在政府的立法過程中被彰顯。若中位數選民的位置，在政府制訂政策不具有關鍵性影響力，政府的執政就偏離了

大部分的民意。一般認為比例代表制比起單一選區多數決制，更能夠使得政府的政策的位置接近中位數選民的立場（Powell, 2000；Powell and Vanberg, 2000）。學者同樣發現比例代表制比起單一選區多數決制，較符合授權理論上的要求（McDonald and Budge, 2005；McDonald et al., 2004）。雖然上述的研究確認了比例代表制的優勢，但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到底哪個政黨的政策立場會勝出，或是對最後的公共政策的產出有何影響，則尚未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學者進一步把政府決策過程做深入的研究，把黑盒子打開，從中位數國會議員的政策位置、國會中的多數黨的政策位置、否決者的政策位置，以及政黨在國會中的席次比例的加權平均的政策位置等假設來判斷政府決策過程的可能影響，以上討論都證明了比例代表制在反映中位數選民的議題位置較單一選區制優越（Powell, 2006）。

但是也有其他研究反駁上述的論點。Blais 和 Bodet 的研究指出，比例代表制在提升回應性方面，不一定優於單一選區制。他們認為比例代表制提供了較多的政黨選擇，也同時減低了政黨政策位置趨中的誘因，這造成了政策立場較不趨中政府出現的可能性提高。但是比例代表制也同時有相反的影響力，提高多個政黨的聯合內閣出現機率，而聯合內閣政府的政策立場通常來說是趨中的。相互抵銷的兩個效果，使得在比例代表制下，提升代表性的制度效果接近零。他們並運用跨國民調資料轉化成總體層面的指標，來證明此一論點（Blais and Bodet, 2006）。再者，另有學者認為代表性不應該只看分布中的單一統計變數中位數而已，應該考量整個選民偏好分布與議會中所有政黨政策立場契合的情況。他們亦認為比例代表制和單一選區制，對選民偏好和政府政策立場的一致性的效果差異不大（Golder and Stramski, 2010）。

Powell 認為新的研究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是來自於資料時間範圍的不同。若以 1990 年代為分水嶺，新的研究採用的資料是從 1996 年到 2004 年以來發生的各國政府的運作情況，在這段期間兩種

選舉制度的效用差異不大，因為單一選區制產生的公共政策結果，倚賴於政府的多數黨的議題立場，這些多數黨的議題立場，是當下時空環境與政府體制和選舉制度的制約，交互作用產生的。也就是說，單一選區制的大多數黨的議題立場的變異程度比較高，有可能接近，也有可能不接近中位數選民的位置（Powell, 2009）。無論如何，這些研究都初步的證明了選舉制度對於代表性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二、選舉制度對黨內提名制度的影響力

與選舉制度的研究相比，關於黨內提名制度的研究發展的時間比較晚也比較不完整，Gallagher 和 Marsh (1988) 主編的《從比較的視角來看候選人提名：政治的祕密花園》(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 是近期有關跨國黨內提名制度的研究之一。Gallagher 認為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品質決定了民意代表的品質，也決定了選後國會的品質與政府官員的品質。在某個程度上來說，也決定了國家政治的品質。政黨提名程序的改變，可能對國內的政治運作有直接的後果，更進一步來說，政黨選擇他們候選人的方式，可被當成政黨多民主地來實行黨內事務的一個嚴峻考驗。」(Gallagher, 1988b: 1)；Schattschneider 認為（候選人）「提名過程是政黨的關鍵過程，提名程序的本質決定了政黨的本質，那些可以決定提名人選的人是政黨的擁有者，因此這是觀察政黨內部權力分布的最佳角度。」(Schattschneider, 1942: 64)；⁴ Ranney 也認為「黨內派系最重要且激烈的競爭是發生在候選人選擇上的鬥爭。這些敵對的陣營都知道，在這個鬥爭裡面的利害關係並不亞於對政黨主張和政黨如何實

⁴ 原文為“The nominating process thus has become the crucial process of the party. The nature of the nominating process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the party; he who can make the nominations is the owner of the party. This is therefore one of the best points at which to observe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party”。

行主張的核心的控制。」(Ranney, 1981: 103)；⁵因此，黨內候選人提名過程十分重要，但是其制度與選舉制度相比，卻比較不穩定且易於被修改，但這些變動也非經常性的，因此候選人提名制度，應視為反映政黨的本質和影響政黨政治制度機制 (Hazan and Rahat, 2001)。

Hazan 和 Rahat 提出分析黨內提名制度的架構可以從四個方面著手：選舉人團 (selectorate)、候選人資格 (candidacy)、分權程度 (decentralization) 與投票或指定程序 (voting versus appointment)。選舉人團指的是那些有權決定候選人的成員，從最開放到最封閉的程度依序來看，分別是一般選民、政黨黨員、投票產生的政黨機構、提名委員會到單一領導者。候選人資格指的是誰有資格進入政黨內的提名程序。同樣從最開放到最封閉的程度依序來看，所有公民、政黨黨員到黨員加上額外的限制。分權程度指決定候選人的權力集中模式，分成地域的和功能的面向。在地域面向上，地方黨部有權力來決定誰成爲候選人就越分權，在功能面向上，爲了確保特定團體或族群的代表性，一般會利用保留席次的方式，或是運用特定區域選區或社會團體選區的劃分，確保少數團體被提名。整體而言，政黨候選人如何藉由投票或指定程序選出，是關於提名產生的不同方式 (Hazan and Rahat, 2006, 2010)。

基本上，選舉人團與分權程度兩個面向，可以構成提名制度的集中性指標。選舉人團越封閉且分權程度越低，則提名程序是最集權的，選擇者越開放且分權程度越高，則提名程序是最民主的。從 1990 年代以來，各國政黨的黨內提名制度有開放性變高的趨勢，此處的民主化是指選擇人團，以開放民眾參與提名過程來增加政黨的支持度 (Bille,

⁵ 原文爲 “It is therefor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most vital and hotly contested factional disputes in any party are the struggles that take place over the choice of its candidates; for what is at stake in such a struggle, as the opposing sides well know, is nothing less than control of the core of what the party stands for and does”。

2001; Pennings and Hazan, 2001)。如國民黨在 1989~2000 期間的提名過程即展現出類似的趨勢 (Wu, 2001)。也有學者認為在東亞國家的政黨為了減低黨內由恩庇侍從網絡 (patron-client network) 所把持的地方派系 (clientelistic factions) 影響力，綱領性派系 (programmatic factions) 會把候選人提名制度外包給外部的行為者，如選民或民調，以避免黑金的影響力，這樣的例子在台灣和南韓都可以看到 (Hellmann, 2014)。

選舉制度無疑地對黨內提名制度會有影響。當一個候選人必須從一個地方或區域選區選出來，候選人通常會由該區域的政黨組織來提名。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大選區中，中央政黨組織即使無法壟斷提名權，對提名過程依然有很大的影響力 (Czudnowski, 1975)。選票的結構對於候選人的提名也有影響，若選民投票可以直接投候選人，則候選人對地方支持者負責；若選民投票只能投政黨，則候選人對黨中央負責；介於兩個之間是兩票制或偏好投票 (Norris, 2006)。Cross 主張選舉制度、政黨體制和國會議員的任務是影響黨內提名制度的廣義背景因素，而其中又以選舉制度最為重要，因為選舉制度會影響其他兩個因素的運作 (Cross, 2008)。

關於選舉制度如何影響解釋政黨提名程序的權力集中度，學者的論點仍然莫衷一是。Gallagher 認為，在那些選民扮演決定誰當選的角色比較邊緣化的選舉制度，如封閉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中，則政黨中央機構在候選人提名過程中的重要性就增加。但同時，他也發現選舉制度本身，並不影響黨內提名過程的權力集中程度 (Gallagher, 1988a)。不過也有學者反比例代表制下，大規模選區會導致提名過程權力集中化的主張，兩個變項的關係並非如此簡單。從政黨內部來看，可能有影響力的制度因素如政黨組織和非制度因素如權力鬥爭、理念和政黨文化；在政黨外部，在國家體制和法律層面，可能有來自制度因素的影響，如選舉制度 (包括選區規模、選票公式、候選人配

額競選資金等)、地方組織和憲法架構(如總統制或內閣制等),和非制度因素,包括選舉層面如政黨聯盟的輪迴、政黨間的競爭和政黨大小等,在社會層面如群眾政治文化和社經發展等,在相互模仿層面,如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影響(Field and Siavelis, 2008: 626-629)。

從經驗分析來看,Lundell 收集了從 1986 年到 2001 年間 21 個已發展民主國家選舉的黨內提名制度集中程度資料檔。Lundell 把集中程度指標分為 5 個等級,透過迴歸模型來確認相關制度變項的影響,他發現只有政黨大小有效用,大黨比小黨更傾向於使用權力集中的提名制度。其他變項如選舉制度和區域組織都沒有顯著效用(Lundell, 2004)。Shomer 擴大了資料檔的範圍,涵蓋 46 個國家的 512 個政黨的提名過程,透過相關分析和順序邏輯迴歸模型來分析與 Lundell 稍有不同的 8 個等級的黨內提名制度集中程度指標的影響因素。Shomer 發現政黨大小和政體類型沒有影響,而選舉制度的某些特徵的影響力是錯綜複雜的,例如選區規模在相關分析有顯著效用,但是在迴歸模型中的影響力卻消失了,又例如選票的結構中在比例代表之下可以投給候選人個人的類型,譬如開放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Open-list PR)、選擇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可移轉單記投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和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其影響力在迴歸模型中顯著,但是在相關分析上卻無效果(Shomer, 2014)。

三、黨內提名制度對代表性的影響力

黨內提名制度的集中程度,影響了被提名的候選人對在遴選程序中有提名權力的選擇者的反應程度。Crotty 指出「政黨招募的候選人決定了其人事組成,且更象徵性地,決定那些團體在菁英的決策過程中可以被代表。透過甄補,政黨間接地影響了,那些政策形式是可以被執行的,和那些利益是最有可能被聽見的;然後,候選人的甄補,

意味著選民和政策制定過程的之間的一個關鍵連結。」(Crotty, 1968: 260)⁶

黨內提名制度影響了政黨在決策過程的政黨凝聚力和黨紀，進而影響了代表性的品質。黨內提名制度集權程度越低，如透過初選來決定政黨提名候選人，則政黨的結構越鬆散；反之，黨內提名制度集權程度越高，則政黨凝聚力就越高。這對民意代表性的反應，有利有弊，從選舉結果對民意的代表性來看，黨內提名制度集權程度越低，越能反映當下透過投票，民意的表達；同時民意如流水，對選舉之間政策制訂過程，民意變動的反應，則是需要政黨凝聚力越高，越能及時修正政策方向，來符合新民意的期望，這是因為政黨凝聚力高，將進一步影響了政府和國會立法的效率，所以對人民偏好改變的響應程度越快。學者的研究證明了黨中央在政黨名單中的黨內提名制度權力，會延伸到國會當選民意代表黨紀的執行 (Cordero and Coller, 2014)。在混合選舉制度下，若決定區域選區的提名權的選擇者利益，與決定政黨名單提名權的選擇者利益相衝突，他們對國會議員的期望也不同，則尋求連任的國會議員的立法過程的行為，會優先考量前述兩類型選擇者的偏好，次之才是對民意負責。而這兩類型的選擇者，對國會議員的控制力較高，是建立在他們在黨內提名過程中的權力 (Hennl, 2014)。從選舉結果反映民意的角度來看，以日本為例，證明了黨內提名制度越開放、分權程度愈高，政黨提名的候選人立場更趨中，更能反映選民的偏好，甚至和傳統的提名制度比起來，開放提名制度下的候選人，在進入國會後，展現的政策立場一致性程度更高 (Smith and

⁶ 原文為 “The party in recruiting candidates determines the personnel and, more symbolically, the groups to be represented among the decision-making elite. Through recruitment, the party indirectly influences the types of policy decisions to be enacted and the interests most likely to be heard. Candidate recruitment then represents one of the key linkages between the electorate and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sutsumi, 2016)。

從政策制訂對民意變化回應的角度切入，就經驗分析來看，從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在 9 個西歐國家的 53 個政黨中，學者區分，黨內提名制度裡選舉人團和分權程度兩個面向對政黨代表性的影響。研究發現，選舉人團對政黨支持者的政策立場的反應程度有影響，採用越封閉式選擇者較採用比較開放式選擇者的提名方式的政黨，具有較高的代表性 (Spies and Kaiser, 2014)。

參、一個因果分析模型

根據上面文獻的討論，目前的學術研究都僅各自檢查，從民意到民意代表產生過程的一部份，只考慮了選舉制度，或者只考慮了黨內提名制度，並沒有同時納入這兩個制度對政治代表性的影響。近期有學者嘗試結合這兩個制度的影響力，來探討對國會議員政黨凝聚力和忠誠度，在立法過程中的作用 (Itzkovitch-Malka and Hazan, 2016)，也佐證了本文的因果分析模型的完整性。

本文主張，前述關於選民偏好和政策產出連結的選舉制度與黨內提名制度的效用，都僅僅捕捉了此過程的一部份而已，這使得對於這兩種制度效用的研究有所偏頗。若我們只有用選舉制度做為獨立變項 (X)，而選民偏好和政府政策的契合度做為依變項 (Y)，可以估算下列的模型：

$$Y = i_1 + cX + e_1. \quad (1)$$

這個模型描述了上節的第一段落中對於選舉制度效果的研究，此時 c 的效果並未單獨分離出黨內提名制度的效用，而是假設兩者的效用是不可分離的 (Carey, 2009 ; Carey and Shugart, 1995 ; Chang and Golden, 2007 ; Shugart, 2001)。但是這個假設並未考慮黨內提名制度的變異

性，即黨內政治的派系競爭，另一方面，這個模型無法區分黨內提名制度的效用。

同時，我們也可以把黨內提名制度 (M) 當成中介變項，估算下列的模型：

$$Y = i_2 + cX + b'M + e_2; \quad (2)$$

$$M = i_3 + aX + e_3. \quad (3)$$

公式 (3) 描述了上節的第二段落中選舉制度的對於黨內提名制度效果的研究。在控制了中介變項之後，選舉制度對代表性契合度的影響力從 c 變成 c' ， c' 是在考慮了黨內提名制度效用後，選舉制度對於依變項的直接效應。而選舉制度透過黨內提名制度對依變項的間接效應是 a 和 b 的乘積 $ab = c - c'$ 。換言之，總效應是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總和，而間接效應的大小與選舉制度和黨內提名制度的相關程度（參數 a ），和黨內提名制度對代表性的影響程度（參數 b ），息息相關（MacKinnon, 2008: 48-51）。

若我們單獨把中介變項當成一個獨立變項，則估計下列的模型：

$$Y = i_4 + b'M + e_4. \quad (4)$$

如果上節的第三段落中黨內提名制度效果對於代表性契合度的研究，未考慮選舉制度的效用，則會造成遺漏變數偏差（omitted variable bias），我們估計出來的效果是 b' ，而不是 b 。所以這部分的研究必須控制選舉制度變項，不過即使如此，這個數量 b 也只是選舉制度對代表性契合度的間接效應的一部分而已。

因此，要探討選舉制度對代表性契合度的影響力必須同時估計公式 (2) 和公式 (3)，而這個因果模型的前提是選舉制度確實是先於中介變項和依變項出現。另一個關於模型估計的問題是分析單位，選舉制度是一個國家總體層面的變項，而黨內提名制度是一個國家內部各政

黨的總體層面變項，由於後者的分析單位較小，故模型的分析單位應該是政黨。

此模型的分析途徑的目的，為解析不同選舉制度下，和內部不同政黨體系的黨內提名制度，如何同時對政治代表性造成影響，故這是一個多層次（multi-level）分析模型。為了達成有足夠資料驗證理論模型的目的，模型中的主要變項多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變異性才能進行統計模型的分析，所以資料收集的範圍以多國多選舉為目標。選舉制度的範圍可以代表性高低排序為例：比例代表制(3)、混合選舉制(2)、單一選區制(1)，括弧裡面的數字代表資料的編碼，比例代表制涵蓋開放名單比例代表制、封閉名單比例代表制和兩票的聯立制。混合選舉制主要是兩票並立制。單一選區制有相對多數決制、兩輪決選制和選擇投票制。黨內提名制度則依照提名權力的集中程度分成五個等級：完全由黨中央決定提名(1)、黨中央提名過程會受到地方黨部和黨員投票的影響(2)、完全由地方黨部和黨員投票決定提名(3)、地方黨部和黨員投票和選區民調決定提名(4)和完全由民調或黨內初選決定提名(5)。最後是政治代表性的定義，假設每個政治體系中，都有一個主要社會分歧，來區分主要政黨的政策綱領，譬如左右議題的單一光譜，假設尺度的範圍是從0到10，可以測量每個政黨在此議題上的位置，然後找出選民在同一議題的立場分布，則代表性可被測量為，執政黨的政策位置和中位選民的位置的距離，距離越小，則代表性越高。

肆、模型的初步檢驗－台灣的案例分析

為了驗證前段提出理論模型的合理性，必須提供模型中因果機制的初步證據，因此以台灣民主化後的國會全國大選為例進行分析。台灣中央層級的選舉主要有兩種類型：總統和立法委員，這邊案例著重於國會的基本原因，在於立法委員的選舉的基本目的，是把全國不同

的團體和個人的意見，反映到政策制訂過程當中。討論的時間範圍，以 1992 年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的全面改選，為起始點，因為這代表台灣民主化的里程碑，而注重的政黨對象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為主，因為他們是目前台灣的兩大政黨，且輪流執政。

本文提出的模型關係包含公式 (2) 和 (3)，是一結構方程式模型，公式 (2) 說明，政治代表性會同時受到選舉制度和黨內提名制度的影響，不過也有內生性 (endogeneity) 的問題，會導致公式 (2) 的估計有偏差，⁷ 因為公式 (3) 說明黨內提名制度會受到選舉制度的影響。首先我們先以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來證明公式 (3) 的關係。

台灣立法委員選舉，從 1992 年全面改選以來，確實促使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提名制度，不斷的變革，尤有甚者，從 2008 年的第七屆選舉後，更把選舉制度從原本的單記非讓渡投票法 (SNTV)，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此一類似社會實驗的制度變革，更可以進一步評估選舉制度的改變，對政黨提名制度造成的影響。對照上述變項運作化討論，選舉制度可謂從 (3) 變動到 (2)。台灣立法委員選舉的選舉制度，從 1992 年的第二屆到 2004 年的第六屆，使用 SNTV，在一般中選區規模下的一票制，所以依賴政黨有效評估在各選區的選票基礎，並做出適當的提名人數，才可以把席次極大化，若所有政黨的選舉計算都正確，則選舉結果的比例代表性，將接近比例代表制 (Cox and Niou, 1994)。以國民黨為例，在 1992 年第二屆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時，為了降低地方派系的操控，因此採取黨員不記名投票 50% 和幹部評鑑 50% 的提名制度，但是該屆國民黨席次，受到地方派系的抵制而下降，之後在第三屆和第四屆立法委員提名，國民黨改採黨內意見調查為主，幹部評鑑和民調為輔的初選方式，比較具有協調的精神。但是隨著台灣民主

⁷ 關於迴歸模型由於內生性造成的估計偏差，以及修正方式，請參考 Wooldridge (2016) 的第 15 章。

的深化，與民眾自主意識的抬頭，國民黨在第五屆立法委員的提名，加入了民意調查，成為黨員投票 50% 和民意調查 50% 的提名制度，甚至在 2004 年第六屆立法委員的提名，把民意調查的比重提升到 70%（Wu, 2001；許哲瑋，2012）。就變項運作化來看，國民黨的黨內提名制度，從第二屆到第六屆，可謂是 (2)、(3)、(3)、(4)、(4) 的編碼。⁸ 這個趨勢顯示出國民黨的提名制度，不斷的民主化的過程。

在選舉制度改革前，民進黨的提名制度，從 1992 年到 2004 年，為了勝選的考量，都是以溝通協調為主要機制，但是也有其他的輔助機制。從輔助機制的改變，我們可以看出與國民黨類似的提名民主化過程，在第二屆的提名也包括黨員投票來決定提名人選，到了第三屆變成黨員投票 50% 和幹部投票 50%，在第四屆的提名，民進黨率先加入民意調查的機制，改成黨員投票 50% 和民意調查 50%，在 2001 年的第五屆和 2004 年的第六屆，更是把民調的比重提高到 70%（許哲瑋，2012）。如果要變項運作化，民進黨的黨內提名制度，從第二屆到第六屆，可謂是 (3)、(3)、(4)、(4)、(4) 的編碼。這顯示出民進黨提名策略的彈性，而且貼近民意的反應快國民黨一步。

從 2008 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開始，選舉制度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並立制，且席次減半為 113，有區域席次 73，比例代表席次 34，和原住民席次 6。單一選區多數決對大黨比較有利，不利於當時的小黨，泛藍陣營的新黨和親民黨，和泛綠陣營的台灣團結聯盟，所以在提名方面，小黨和大黨協調或結盟。雖然在第七屆的立法委員提名，國民黨和民進黨在與各自陣營的伙伴協調下，沒有更動黨內初選的制度，兩大黨都維持和上一屆的提名方式相同，除了民進黨的民意調查有中度排藍之外。在經過了新選舉制度的洗禮，在 2012 年的第八屆的立法委員提名，兩大黨都體會到民意之所向是勝選的唯一考量，所以都改

⁸ 請參考前述對於黨內提名制度五種編碼之定義。

成了全民調的黨內初選，國民黨是政黨對比式 85% 和黨內互比式 15%，民進黨則是先用對手對比式民調來決定人選，若無法決定，則再用黨內互比式決定（許哲瑋，2012）。就資料分析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黨內提名制度，在第八屆，都進一步變動到(5)了。從以上討論來看，兩大黨都在選舉制度改革後，把提名的權力更為分散，也彰顯出選舉制度對黨內提名方式的影響。政黨為了選舉勝選的考量，能夠更貼近選舉舉行時下的民意，所以兩黨黨內初選，皆採用全民調的方式來進行，以求能篩選出民意支持度領先的候選人，故在選舉結果的民意反映上，其政治代表性是提升的，正如 Smith and Tsutsumi (2016) 對日本的研究印證的。

在確認了公式(3)的部分證據後，我們接著檢查公式(2)，表明政府政策的產出和人民偏好之間的差異，受到選舉制度和黨內提名制度的影響。以統計的語言和 Downs 的中位數選民空間理論的概念來說，假設一個政治體系的選民在主要議題面向上的立場，呈常態分布，以台灣為例，這個面向是統獨議題立場，大部分的選民的統獨態度是維持現狀，在其兩側，是人數較少偏統和偏獨的選民，再往兩邊移動，是人數更少的急統和急獨的選民；假設這個常態分布的參數是，平均數 μ ，和標準差 σ ，因為對稱特性，所以其中位數也是 μ 。就政治代表性的操作化來看，是政府政策產出在統獨議題面向上的位置，與選民在同一議題立場上的中位數，兩者之間的距離表示了代表性的高低，距離越近，代表性越高。選民透過選舉，選出民意代表來反應這個常態分布，那麼民意代表統獨議題立場的分布為何？可以預期，民意代表的議題分布範圍，相較於全體選民的範圍要窄，因為民意代表是整體選民的一部份而已。那麼選舉制度，如何影響這個民意代表的議題分布呢？在 SNTV 下，因為候選人的選民基礎，只要到達當選門檻即可，所以其分散程度（假設為 σ_1 ）較高，但仍然小於 σ ，故 $\sigma_1 < \sigma$ 。當選舉制度換成單一選區兩票制，此時候選人為了勝選，趨中的誘因增

加，所以民意代表的議題分布範圍的分散程度（假設為 σ_2 ），會更為縮小，故 $\sigma_2 < \sigma_1$ 。這意謂著，要在分布範圍更窄的民意代表議題立場分布，制訂出來的政府政策要接近中位數選民 μ 的議題位置，其機率會降低。換言之，在此理論框架下，新國會選舉制度的採用，以本文定義的代表性來評判，會導致政治代表性的降低。

爲了進一步驗證上述模型推論，本文使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時間橫跨第五屆到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來提供初步的證據。在歷屆的選後調查當中，其中一個題組是詢問選民在 0 到 10 空間的統獨立場，⁹ 接著進一步探問選民認知的國民黨和民進黨統獨立場爲何，因此選民認爲的兩黨統獨立場，可被視爲是兩黨在兩岸政策上的綜合評估。根據前段討論，我們推論在 SNTV 下，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民意代表的議題位置的分布，分別代表他們支持的選民基礎，這兩個分布的變異程度小於整體選民的變異數，隨著選舉制度的改革，這兩個分布的變異程度會進一步縮小。但是我們目前並無所有歷屆兩黨立法委員，在統獨立場主張的資料，一個替代的指標是比較這兩個分布的平均數距離的變化，以此來衡量變異程度是否進一步縮小的推論，如果比較 SNTV 和單一選區兩票制，發現平均數距離縮短，代表在新選舉制度下，兩黨民意代表分布更爲往中間靠近，這也提供了理論推論的部分證據。

表 1 提供了從第五屆到第九屆立委選舉的兩黨統獨立場的平均數及距離。在表 1 中，可觀察到選民自我評估平均數，在 21 世紀是有變動的，往偏獨的方向移動，這也符合年輕世代對大陸認同減低的態度變化，這些新加入的選民比較本土化，隨著世代交替，選民統獨立場分布

⁹ 題目是「我們社會上的人常討論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的問題，有人主張台灣應該儘快宣布獨立；也有人認爲兩岸應該儘快統一；還有人的看法是在於這兩種看法之間。如果主張台灣應該儘快宣布獨立的看法在一邊，用 0 表示；認爲兩岸應該儘快統一的想法在另一邊，用 10 表示。請問您比較靠哪裡？」

的平均數是變小的。進一步觀察兩黨平均議題位置的距離，發現在舊選制 SNTV 下，從 2001 到 2004 是從 4 加大到 5，2008 年的選舉是新選制採行的第一屆，其效果並不明顯，甚至可以說是對原本的政黨體系毫無撼動，距離只縮小了 0.02，但是從新選制採行的第二屆開始，距離的縮短明顯加快，從 5 縮小到 4，到了 2016 的新選制的第三屆，兩黨平均議題位置的距離的縮小，已經達到了縮短 1 的幅度。這也提供了上述公式 (2) 的部分驗證。從議題平均位置來看，民進黨勝選而執政的 2016 年立委選舉，民進黨與選民位置的距離為 1.27，而國民黨為 2.97。從兩黨位置距離的趨勢來看，其距離逐步拉近，但是民進黨與選民位置的距離逐漸縮小，而國民黨則有所波動，但在 2016 年國民黨失掉政權時與選民的距離最遠。

表 1 選民評估國民黨和民進黨在 0 到 10 空間的統獨位置平均數，2001-2016

	選民位置	國民黨	民進黨	兩黨距離
第五屆立委選舉，2001	5.17	7.18	2.58	4.60
第六屆立委選舉，2004	4.67	7.43	2.15	5.28
第七屆立委選舉，2008	4.67	7.45	2.19	5.26
第八屆立委選舉，2012	4.54	7.04	2.59	4.45
第九屆立委選舉，2016	4.39	7.36	3.12	4.24

說明：本文使用的資料部分係採自「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多年期計畫，計畫主持人為黃紀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 TEDS 網頁：<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討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前述的因果模型讓我們瞭解現代代議制運作的過程，到遴選出合格的代議士為民喉舌的這個階段，選舉制度佔據了重要的角色，不但規定了選民偏好表達投票數如何轉換成當選席次的計算公式的依據，同時也影響了政黨黨內的提名策略，這與選民在投票時的抉擇多寡，和有哪些選擇可以投票息息相關。對於公民偏好的投票行為，除了選舉制度的制約外，也不該忽略黨內提名制度，對於選前限縮選民可投票選項造成的影響。

從之前關於不同制度變項的影響力經驗分析可以發現，不同的研究所採用的資料時序和區域範圍差異非常的大，這很有可能是造成這些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因此如果要完整測試，本文所提出的因果模型裡面的路徑關係，則儘可能的收集區域範圍涵蓋越廣，且時序範圍跨越越長，是進行下一步研究的首要任務。

而擴大資料範圍的收集，也具有進一步比較成熟民主國家與發展中民主國家的實質意義。學者主張發展中民主國家的黨內提名制度，與制度化民主國家相比，其影響力會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政治的不確定性較高、政黨組織比較不穩定、選舉制度的策略複雜性較高、政治聯盟形成的必要性較高。這四個因素會促使黨內提名制度的權力集中度變高，因為在這些因素存在的情形下，需要更多不同層面的協調，才有可能贏得勝選 (Field and Siavelis, 2008)。所以擴大資料範圍到發展中民主國家，不但有助於我們了解黨內提名制度的運作與在成熟民主國家的運作有何差異，亦能檢驗關於黨內提名制度，在成熟民主國家的運作的研究結論是否也能適用於發展中民主國家。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許哲瑋 (2012)。《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國民黨與民進黨提名制度之研究－以第七屆及第八屆立委選舉為例》。新北市：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二、英文部分

- Amorim Neto, Octavio and Cox, Gary W. (1997). "Electoral Institutions, Cleavage Structure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1): 149-174.
- Bille, Lars. (2001). "Democratizing a Democratic Procedure: Myth or Reality?" *Party Politics* 7(3): 363-380.
- Blais, André. (2000). *To Vote or Not to Vote? The Merits and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Blais, André and Bodet, Marc André. (2006). "Does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Foster Closer Congrue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cymake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10): 1243-1262.
- Carey, John M. (2009). *Legislative Voting and Account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ohn M. and Shugart, Matthew Soberg. (1995). "Incentives to Cultivate a Personal Vote: A Rank Ordering of Electoral Formulas." *Electoral Studies* 14(4): 417-439.
- Chang, Eric C. C. and Golden, Miriam A. (2007). "Electoral Systems, District Magnitude, and Corrup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1): 115-137.

- Chen, Tse-hsin. (2011). "Uncovering the Micro-foundation of Turnout and Electoral Systems." *Electoral Studies* 30(2): 295-308.
- Cordero, Guillermo and Coller, Xavier. (2014). "Cohesion and Candidate Selection in Parliamentary Groups." *Parliamentary Affairs* 67(1): 1-24.
- Cox, Gary W. (1990).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Incentiv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4): 903-935.
- Cox, Gary W.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x, Gary W. and Niou, Emerson. (1994).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2): 221-236.
- Cross, William P. (2008). "Democratic Norms and Party Candidate Selection: Taking Contextual Factors into Account." *Party Politics* 14(5): 596-619.
- Crotty, William J. (1968).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its Activities." In William J. Crotty (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arty Organization*, pp. 247-306.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Czudnowski, Moshe M. (1975). "Political Recruitment."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155-242. Reading: Addison-Wesley.
- Dahl, Robert Alan.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obert Alan. (2006). *On Political Equ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lton, Russell J. and Anderson, Christopher J. eds. (2011). *Citizens, Context, and Choice: How Context Shapes Citizens' Electoral Cho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ield, Bonnie N. and Siavelis, Peter M. (2008). "Candidate Selection Procedures in Transitional Polities." *Party Politics* 14(5): 620-639.

Fox, John. (2008).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Thousand Oaks: SAGE.

Gallagher, Michael. (1988a). "Conclusion." In 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 (eds.), *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236-283. London: Sage.

Gallagher, Michael. (1988b). "Introduction." In 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 (eds.), *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19. London: Sage.

Gallagher, Michael and Marsh, Michael eds. (1988). *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 London: Sage.

Golder, Matt and Stramski, Jacek. (2010). "Ideological Congruence and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1): 90-106.

Hazan, Reuven Y. and Rahat, Gideon. (2001).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Party Politics* 7(3): 297-322.

Hazan, Reuven Y. and Rahat, Gideon. (2006).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and Consequences."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J.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pp. 109-121. Thousand

Oaks: Sage.

- Hazan, Reuven Y. and Rahat, Gideon. (2010). *Democracy within Parties: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llmann, Olli. (2014). “Outsourcing Candidate Selection: The Fight against Clientelism in East Asian Parties.” *Party Politics* 20(1): 52-62.
- Hennl, Annika. (2014). “Intra-party Dynamics in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How Strategies of Candidate Selection Impact Parliamentary Behaviou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6(1): 93-116.
- Huber, John D. and Powell, G. Bingham, Jr. (1994). “Congrue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cymakers in Two Vis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6(3): 291-326.
- Iitzkovitch-Malka, Reut and Hazan, Reuven Y. (2016). “Unpacking Party Unit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Electoral Systems and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on Legisla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ural Norms.” *Political Studies* 65(2): 452-474.
- Katz, Richard S. (2006). “Party in Democratic Theory.”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J.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pp. 34-46. Thousand Oaks: Sage.
- Kedar, Orit. (2009). *Voting for Policy, not Par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1994).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2008). *Thinking about Democracy: Power Sharing*

- and Majority Ru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 Lijphart, Arend.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undell, Krister. (2004). "Determinants of Candidate Selection." *Party Politics* 10(1): 25-47.
- MacKinnon, David P. (2008).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McDonald, Michael D. and Budge, Ian. (2005). *Elections, Parties, Democracy: Conferring the Median Mand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Donald, Michael D., Mendes, Silvia M. and Budge, Ian. (2004). "What Are Elections For? Conferring the Median Mandat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1): 1-26.
- Norris, Pippa. (2004).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ippa. (2006). "Recruitment." In Richard S. Katz and William J.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pp. 89-108. Thousand Oaks: Sage.
- Pennings, Paul and Hazan, Reuven Y. (2001). "Democratizing Candidate Selec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arty Politics* 7(3): 267-275.
- Pitkin, Hanna Fenichel. (1967).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well, G. Bingham, Jr.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owell, G. Bingham, Jr. (2004).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Comparative

-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7: 273-296.
- Powell, G. Bingham, Jr. (2005). “The Chain of Responsiveness.” In Larr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pp. 62-76.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owell, G. Bingham, Jr. (2006). “Election Laws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s: Beyond Votes and Sea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2): 291-315.
- Powell, G. Bingham, Jr. (2009). “The Ideological Congruence Controversy: The Impact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Data, and Time Periods on the Effects of Election Rul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12): 1475-1497.
- Powell, G. Bingham, Jr. and Vanberg, Georg S. (2000). “Election Laws, Disproportionality and Median Correspondence: Implications for Two Visions of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3): 383-411.
- Rae, Douglas W. (197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anney, Austin. (1981). “Candidate Selection.” In David Butler, Howard R. Penniman and Austin Ranney (eds.), *Democracy at the Poll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petitive National Elections*, pp. 75-106.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s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Riker, William H.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Schattschneider, E. E.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 Shomer, Yael. (2014). "What Affects Candidate Selection Processes? A Cross-National Examination." *Party Politics* 20(4): 533-546.
- Shugart, Matthew Soberg. (2001). "'Extreme' Electoral Systems and the Appeal of the Mixed-Member Alternative." In Matthew Soberg Shugart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eds.),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pp. 25-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Daniel M and Tsutsumi, Hidenori. (2016).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and Policy Cohesion in Parties: The Impact of Open Recruitment in Japan." *Party Politics* 22(3): 339-353.
- Spies, Dennis C and Kaiser, André. (2014). "Does the Mode of Candidate Selection Affect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Parties?" *Party Politics* 20(4): 576-590.
- Taagepera, Rein. (2007). *Predicting Party Sizes: The Logic of Simple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agepera, Rein and Shugart, Matthew Soberg. (1989).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ander Weele, Tyler J. (2015). *Explanation in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 for Mediation and Inter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ldridge, Jeffrey M. (2016).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 Wu, Chung-li. (2001).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umintang's Candidate Selection System." *Party Politics* 7(1): 103-118.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lectoral Systems, Candidate Selection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 Analysis Framework*

*Tse-Hsin Chen***

Abstract

The main task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how the linkage between a political system's inputs, public opinion, and its output, public policies, is influenced by intra-party recruitment and inter-party electoral competition at the aggregate level. The study examines the linkage in two steps. If we defin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hich is the congruence between the electorates' preferenc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we can treat the electoral system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This path is the direct effect. Furthermore, the electoral system can impact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candidate selection process. This path is the indirect effe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propose a conceptual model, which delineat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variables and differentiates the possible magnitude of their eff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Electoral System, Candidate Selection, Causal Model

* DOI:10.6164/JNDS.201806_17(2).0002

** Tse-hsin Che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sehsin@mail.ntpu.edu.tw

